

“下沉一级”监督一把手

秦丹



今日论语

“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日前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的。他特别强调,第二轮巡视,要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个部门一把手作风正,上行下效,这个部门的风气就坏不到哪里去。一把手总揽全局,推进工作,其岗位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一把手而言,权贵是相称的。一些地方的一把手频频“出事”,究其原

因,还在于将权力看得重了,把责任看得轻了。把权力看得重,把责任看得轻,就会犯要政绩不要民心的错误,就会以权谋私,脱离群众。

一把手的权力,尤其要关进制度的笼子。去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2011年度审计报告时指出,审计署共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112起,涉及300多人,其中“一把手”的职务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43起。据报道,违纪违法的“一把手”占同级违纪违法干部的比例,一般都在三分之一以上。“一把手”为何易出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从而导致“上级管不到、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的情况。

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如何保证领导干部风清气正,就必须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第二轮巡视中王岐山高度强调监督一把手,突显了和延续了中央整饬吏治的决心。

实际上,针对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一把手行使权力,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但是,一把手的权力到底有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管,在权力仍过于集中的背景下,恐怕“下沉一级”考察了解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

到一把手工作过的地方了解一把手的政绩,这种“下沉一级”的做法,容易对一把手作出全面准确的政绩评估,也容易了解到真问题。恰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这次抓一把手是抓到了点子上,非常准确、精到,抓住了反腐败的‘根子’。”

保证一把手不远离群众、逾越法律,不仅是转变政府机构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下沉一级”监督一把手,可以说强有力的巡视制度只是开了个好头,接下来仍有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且莫片面迷恋“日新月异”

权威声音

“日新月异”一词,曾经让我们欣慰,也是今天各地发展仍喜闻乐见的。但在面对文化遗存的保护时,却令人纠结了。大约是唯“日新月异”才能解决现实堆积的矛盾,也比较容易凸显执政一方的政绩,一些地方对“日新月异”有种异乎寻常的迷恋,大拆大建几乎成了城市发展的必选项。

近期关于济南老火车站的拆

与建,就再度成为舆情焦点。对历史遗存忽拆忽建,这种现象在不少地方都存在。衣食足,而知礼仪,而知文脉之可贵。今天,公众渐渐发现,曾被藐视的老建筑老古董,是城与乡存在的根由和象征,珍藏着来自古代、来自先祖的气息与体温,也温暖着今人的心灵,有了这些历史的靠山,我们在奔向梦想的途中,更踏实、更有主心骨、更有人文底蕴。怎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因片面追求“日新月异”,让五千年文明遗存在现代化浪潮中跌落散失?

守土有责,是地方领导干部的天职,守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应有土地上的文脉。拆旧建新屡屡发生,让人如何放心得下?也许缘由之一,是,莫名拆毁文物的那些人,往往难以追责。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昨天的记忆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管有多少利益在身后蠢蠢欲动,都请记住,文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故园。别再瞎折腾了,行吗?(李泓冰 原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天价「道具」

山东青州客运站落成四五年来,一直门可罗雀,平均每天售票仅四百余元,经常可见的景象是,停车场无一辆大巴,售票厅没一名旅客。当年作为地方形象展示窗口精心设计的这家大型长途汽车站,因为规划得不科学,如今几乎成了一个天价「道具」。

孙绍波画

自由谭

太多时候,对那些被媒体关注且达成救助效果的新闻当事人,我只能表达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们确实是不幸的,如果没有记者长篇累牍的报道,他们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又是幸运的,一旦进入“媒体圈”,剧情便有可能反转,境遇也随之有所改变。

“戏剧性”的一幕最近发生在锯腿的硬汉身上。河北农民郑艳良死马当作活马医,用“锯掉右腿”的悲情博得了媒体的关注。之后医院开始免费为其治疗,市长送来了慰问金,各种捐款也如潮而至。命运亏欠他的,在舆论关注后,他得到了补偿。

然而最新的消息却让人哭笑不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我怕媒体忘记我,

一旦没有了媒体的关注,医院会不会无能为力?”甚至,他还埋怨记者去关注那些和他一样得了大病的村民。“硬汉争宠”,这是媒体给他的“补充评价”。

对于和郑艳良同样处境的人来说,幸与不幸几乎完全系于是否能被舆论关注。“别让记者忘记我”,郑艳良直白的表达让人感觉有几分“黑色幽默”,可是分明又能体悟到,这“幽默”中的无奈。有多少类似郑艳良这样的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在媒体高度关注其境遇,并为之带来改变时,他们表达着感谢;当媒体聚焦的眼神渐行渐远,即便当事人有太多不舍,终归还是难以说出那句“请别

忘记我”。

好吧。我们大抵可以把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媒体依赖症”。能依赖媒体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终归是少数人的幸运。所以每次看到新闻里那些悲苦的当事人时,我总会想起和他们命运相似却没有进入媒体视野的“同类人”。大多情况下,媒体是“挑剔”的,如果你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媒体又拿什么“新闻眼”去关注你?即便是悲苦,它也需要“卖点”,郑艳良的“幸运”正是在于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锯右腿”。当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介入的时候,“媒体依赖症”势必成为无助者眼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办公室里,我曾接待过一些

拿着各种材料求助记者的访客。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这事恐怕也只有记者能帮了。”他们希望记者能帮他们伸张一下正义,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不公;他们希望记者能报道他们的困苦,以期赢取社会爱心帮他们渡过难关。可很多时候,自己只能很客套地告诉他们,先把材料留下,我们再想办法。送他们走出办公室的一刻,看着他们的背影,你知道,你和他们的交集只此一次,再无后续。

有人把媒体介入社会、通过媒体报道治理社会称之为“媒治”。媒治终究是靠不住的,这也是社会的共识。而所谓的“媒体依赖症”又该如何祛除?



新民随笔

一桩旧闻

沈月明

关于南京两女童被饿死的惨剧,我一直回避去了解细节,因为你能感受到的,无非是痛上加痛。

上周幼童生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接受审判,媒体再度聚焦。其中一则标题让我心头一颤:今年四月,幼童的曾祖母曾寻求将孩子送孤儿院,但遭社区书记拒绝。

在今年三月的某一天,两个分别只有3岁和1岁的幼童,打开房门出来求救,身上都是粪便,还有蛆,1岁的孩子因为裹的尿不湿没人换,屁股都烂了。如此惨状引起了社区和派出所的注意,并立即给予了金钱和物质上的援助。但谁也没想过把孩子从早已沉溺毒品丧失人性的母亲手中带走。一位担心“惹麻烦”的邻居退还了钥匙停止给孩子送饭,而负责联系这个家庭的民警,也并未经常去看望两个孩子。

了解更多的细节,心情倍感沉痛。当然这是极个别的事例,但在此过程中,若有一方真正负起责任,有更周全的做法,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7年前,我曾报道过一个上海籍母亲在异国因误会“失去”两个孩子的故事。9岁的男童因为受到母亲的批评离家出走,警察发现异常询问时,男童竟乱说一气:妈妈不爱我,妈妈打我。于是这个男童立即被送进寄养家庭保护起来。过了几天,社会福利局的工作人员突访男童家,检查后发现男童5岁的妹妹身上有淤青,尽管母亲解释说是骑自行车摔的,但工作人员根本不听,也把女童“救走”了。情绪激动的母亲还被认为精神有问题,要求她去检查,然后听候法庭的发落,是不是把孩子还给她,要看她的申辩和财务、精神等状况。就此事例而言,以我们的文化,执法部门的做法难以让人接受,一如曾引发广泛争议的电影《刮痧》中的故事。

就南京女童案,以现行的法律制度,在父母双全的情况下,你难以对事件中的警察、社区干部、邻居求全责备。事实说明现行的法律有完善的空间,当监护人虐待儿童或失去了抚养的能力时,有关部门有责任把孩子的监护权接过来,如此类似悲剧才可避免。

“别让记者忘记我”

陈方

忘记我”。

好吧。我们大抵可以把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媒体依赖症”。能依赖媒体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终归是少数人的幸运。所以每次看到新闻里那些悲苦的当事人时,我总会想起和他们命运相似却没有进入媒体视野的“同类人”。大多情况下,媒体是“挑剔”的,如果你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媒体又拿什么“新闻眼”去关注你?即便是悲苦,它也需要“卖点”,郑艳良的“幸运”正是在于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锯右腿”。当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介入的时候,“媒体依赖症”势必成为无助者眼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办公室里,我曾接待过一些

新民新语

排队说真话

乐梦融

罗马希腊圣母堂的门廊处,有着举世闻名的“真理之口”。就是那个古怪的大理石的头像雕刻,远看目盲的老者,罗马人自己也说不清是从何而来,只知道赫本和派克在此处的嬉闹与缠绵,给这座永恒之城又添得了一个值得造访的景致。

沿着台伯河畔漫步,罗马城的遗迹比比皆是,这些公元前建造的废墟前,尽显帝国的辉煌,这栋不太起眼的小教堂有些寒酸了。《罗马假日》里就交代了“真理之口”的来龙去脉:中世纪开始,罗马人就相信它能测谎的传说,有人把手伸进雕像口中的时候说谎,他的手就会被咬住了。

为了这个看点,排队的队伍,从门廊口伸出,绕了半个教堂。来这里的观光客里,结伴的情侣兴致最高,端着摄影机器,摸出半个欧元的门票钱。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像我一样的亚洲面孔,飞跃了半个地球,到这里来排半小时的队,只想着“坦白”一句真话。

“真话”和“愿望”不一样,许愿可以去特莱维喷泉,往碧澈的池水里投上几枚硬币,期许来年多财多子,再来罗马几次。但是,“真话”就是“真话”,是坦陈已经发生的真相,随意扯谎,心里总会不安。

最爱看俊男美女在拍照前私语窃窃,好像问着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然后才双双放心地牵手放在那张石头嘴里,对着镜头数123。比起角斗场里嗜血的尘沙和纪念广场上纪念杀戮的丰碑,这里多了好多浪漫与蜜意。

上一回郑重其事地说真话,要追溯到小时候老师问我,到底有没有拿过别人的橡皮。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类似的。把说真话变得如此仪式化,对成年人多少有点不太适应。很多游客像我一样,买了门票后,就是在那张黑洞洞的真理之口前一边自拍一边傻笑。要问我那时候想坦白一句什么,实话实说,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排队之前,我暗中嗤笑迷信的人群(包括我自己),要说真话,可以随时随地,何必必要长途跋涉来罗马,不是吗?出了教堂,越想越不对,真的能随时随地吗?真话总是和宝贵的秘密相仿,说出来总要带点仪式感,比如挖个树洞。

我无来由地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它斑驳的石墙,落拓拉碴又有点唬人的神明模样,喜欢看着人流满足地离开教堂,喜欢别人搭在“真理之口”上的手,是畏惧缩缩还是坦然伸入,也爱连蒙带猜地看别人准备了什么样的“真话”来此祭献。